Globethics Repository



从相等到平等:马克斯 . 舍勒论基督教民主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 Jing
Publisher	Nordic Forum of Sino- Western Studies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Download date	2026-11-12 22:49:0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9045

从相等到平等:马克斯·舍勒论基督教民主

李　晶

(香港中文大学与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中山大学哲学 2016 级博士后研究员)

摘要:本文分析了舍勒对于一种基督教式的民主理念的理解,来作为他反思天主教在一战战后的欧洲重建中所能发挥的社会凝聚功能的一种构想。这种基督教式的民主强调从创世论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在其价值根源处的万事万物的平等,并由这种平等感引发对于心性品质的锻造,从而实现宗教价值对于社会秩序的奠基作用。舍勒的基督教民主对比出了民主内涵总是通过现代政党政治文化来表达的缺失,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价值论上的监督和引导,而这本身亦是对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如何有效自我定位的一种反思。

关键词:舍勒;基督教民主;基督教社会教义

作者:李晶,香港中文大学与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中山大学哲学 2016 级博士后研究员。地址:广州市中山大学锡昌堂哲学系。电话:+86-147-1601-5529,电邮:youblatterme@gmail.com

民主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不仅越来越变成为普世的价值认同,同时也是许多古老的传统思想在其现代革新的过程中,都不得不处理的问题。自教宗列奥十三世于 1891 年颁布针对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圣谕《新事物》(*Rerum Novarum*)开始,基督教会就逐渐摆脱十九世纪对于民主的冷漠和敌视态度,转而积极在民主价值和基督教价值之间寻求融合。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具体的实践效果来看,这样的努力却并不能称得上成功。一方面,许多以基督教价值为立党基础的政党,例如德国的基民盟(CDU),虽然长期占据执政党的地位,但在特殊政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它们的宗教色彩已然模糊,面对同志权益、堕胎等尖锐的伦理问题也大多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1〕因而他们对于民主制度的坚持在何种程度上仍与基督教的价值信仰相关是颇使得疑问的;另一方面,不少学者把研究基督教民主的重点放在基督教会的民主化上,〔2〕将教会内部的民主生活,例如主教、执事人员的公开选举、圣事活动的民主改革,以及对于各种世俗社会的民主运动的参与等看成是基督教民主最重要的表现方式,但这就让基督教价值屈从于了民主制度的逻辑话语体系,某种程度上并不与基督教价值自上而下的启示方式及其充满价值自信的贵族主义气质相一致。事实上,民主的理念远非完美,从现实的层面上看,新世纪以来阿拉伯之春后的乱局,新近英国的脱欧,以及叙利亚难民问题所带来的逆全球

〔1〕 Peter PULZER,"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European Christian Democracy",*in Christian Democracy in Europe since* 1945. eds.,Michael Gehler and Wolfram Kaiser,(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3. See also Noel D. Cary,*The Path to Christian Democracy:German Catholics and the Party system from Windthorst to Adenau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 基督教民主比较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国别研究,即分别分析例如在拉丁美洲、法国、西德、爱尔兰等国家的教会中民主意识的成长对于教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一般都是以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观念为出发点,从教会的领导方式、政教关系或者说在民主化运动中的作用等层面去探究将教会民主化的可能性,以建构所谓的现代型教会,但这些都不是从基督教的教义和价值根源出发思考它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See Eugene C. Bianchi,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eds.,*A Democratic Catholic Church:the Reconstruction of Roman Catholicism*,(New York:Crossroad 1992)。

化趋势和右翼政党的崛起等,都说明民主价值非常容易被民粹意识或者意识形态思维影响而成为政治工具,因而民主制度反而始终都需要有价值论意义上的外在监督和校正,引导其维系始终与博爱和人道主义紧密相连的"初心",以民主更全面的内涵克服其在政治上的独断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强调认信与服从、上帝主权至高无上的基督教价值,与强调平等和公义、人民主权至高无上的民主价值这两种看起来南辕北辙的理念体系进行对话和碰撞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强烈张力反而能让基督教对民主制度发挥出尖锐的批判性力量,引导它从一种行政工具复归为价值载体,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在探寻民主制度和基督教共同的价值信仰。相较于直接的教会民主化,这样的监督批判和价值引导作用或许才是基督教民主这个看起来自我矛盾的概念得以成立的原因所在。但究竟这种基督教在价值论意义上对于民主制度的引导和监督如何具体地体现出来,这里的基督教指的哪种派别和立场的基督教,它又如何让民主的理念突破传统的政治视野的局限而实践出"万物民主"的人类学视野,本文通过阅读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的《基督教民主》(*Christliche Demokratie*)[3]、《大国民主的精神和理念基础》(*Der Geist und die ideellen Grundlagen der Demokratien der groβen Nationen*)[4]、《论东西方基督教》(*Über östliches und westliches Christentum*)[5]等相关文献,论述他的基督教民主理念,正是为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情绪民主和态度民主

舍勒关于基督教民主的论述出现在他全集的第四卷之中,这一卷的内容,包括《战争天才和德意志战争》、《战争作为集体经验》、《论德意志仇恨的起源》等等,都与反思一战发生的原因和本质以及探讨德国在战后的发展前途相关联,因而舍勒从基督教的角度去理解民主一定程度上是针对战后德国知识分子和政党对于民主趋之若鹜的、跟风式的称颂的不满。他认为民主运动在当时的处境下已经变成为了新的造神运动,任何人只要站在民主的对立面就仿佛会堕入深渊,所有的政党在还没有分析清楚民主的本质、它的价值根源及其背后的世界观之前就盲目地将它写入自己的政党纲要里面,来作为其标榜现代性精神的护身符,这既是愚昧,也是伪善(Heuchelei)。[6] 这些政党以正义的口号来操弄"少数者和多数者"之间的博弈游戏,却并没有细致地分析民主这个概念的多重含义,以至出现了民主在工具意义和目的意义上的混淆。对此,在论述基督教民主之前,舍勒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意涵的民主类型:情绪民主(Gefühl Demokratismus)和态度民主(Gesinnung Demokratismus)。[7] 就前者而言,它是用"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心态来诉求民主;就后者而言,他是用"我有的,别人也要有"的心态来要求民主。从表面上看,这两者都是在强调平等和正义,但实际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舍勒看来,情绪民主的平等要求蕴含着强烈的怨恨因素,它代表着底层民众对于自身相对贫弱的生活处境的不满而要求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尤其是要求与上层的菁英份子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选择权,在这样的动机下,一些具有民粹色彩的市民伦理就可以不断合理合法地"抢班夺权"以至于造成社会的冲突。虽然托克维尔将民主社会这种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动荡解释为一个社会的活力和进步的根源,[8]但舍勒却远没有如此乐观,在他看来,受压迫者的这些民主要求在很大

〔3〕 Max SCHELER, *Politisch-Padagogische Schriften*, (GW Bd. 4.) (Bern: Francke, 1982), 676-691。

〔4〕 Max SCHELER, *Schriften zur Soziologie und Weltanschauungslehre*, (GW Bd. 6.) (Bonn: Bouvier, 1986), 158-187。

〔5〕 SCHELER, GW 6, 99-105。

〔6〕 SCHELER, GW 4, 676。

〔7〕 *Ibid.*, pp. 679。

〔8〕 See Alan S. KAHA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Jacob Burckhardt, John Stuart Mill,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意义上是对自身长期遭受的压力的抒发,本身并无太多建设性的社会贡献,而纯粹是情绪的发泄。对此,舍勒不无讽刺的说,若一个无产阶级有机会成为资产阶级,他会毫不犹豫地改换角色成为他原来诅咒的那种压迫者并反过来剥削他的同志。所以与其说情绪民主建构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Gleichheit),倒不如说它只是建构出了在数量意义上的彼此间的"相等"(Eben),与其说这里的平等是被追求的价值目标,倒不如说它是等待被合理分配的商品。〔9〕舍勒多次提到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这种情绪民主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俄国革命中的同志情怀建立在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许诺之上,并非基于对家园故土和家人同胞的真诚挚爱,它只表现为对于革命这种手段的爱,但这种"不是兄弟,即是敌人"(Willst du nicht mein Bruder sein, so schlag ich dir den Schädel)的爱是非常消极的,并不能建构出真正意义上的团结,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价值凝聚的存在。舍勒认为,高价值的精神活动往往并非在集体性的政治活动中出现,他质疑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个国家和一片土地的归属的做法,因为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全然不能由所谓的多数原则来决定。所以从根本上看,舍勒认为情绪民主的本质就是一种价值的颠覆,以偶然而不稳固的现实利益诉求破坏各种直观而自立的"贵族式"(Aristokratismus)的社会伦理取向,这其中尤以基督教的神圣价值为代表。虽然这番分析看起来非常精英主义化,但却尖锐地指明了许多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实际上都是以人性的性恶论、不可知论以及怀疑论来作为其哲学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平等的实现要付出社会团结被破坏和优质的文明价值不得不向劣质的文明价值妥协的代价。

与之相比,舍勒眼中的态度民主,即要求自己享有的生活福利、道德标准以至于荣耀感,其他人也都能同样拥有,虽然也是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平等,但却在精神气质上与情绪民主大为不同。如果说情绪民主表现出来的往往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般的抗争与战斗的戾气,那么态度民主表现的却往往是"幼吾幼以之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样的充满沉静气质的的慈悲关怀。舍勒说,态度民主事实上是开明统治者的美德,总是表现为服务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充满真诚善意的价值赠予。在这个意义上,态度民主认同的信条总是具有古典意义的"民贵论",而不是现代意义的"人民主权说"。前者通过对苍生苦难的悯恤与同情,表现出"民胞物与"的命运一体感;而后者则强调特权阶层的非法地位,要求弭平阶级差异。客观而言,如果说态度民主是以无法建构共同的优越为耻,那么情绪民主则反而以拥有共同的贫困为荣。在舍勒看来,出现这样的差异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情绪民主已然不具有对于任何客体善的价值信仰,将平等只看成是一个目的论手段,而并非价值论的结果,所以这两种民主所追求的平等事实上存在着作为目标(Ziel)和目的(Zweck)之间的差别。在舍勒眼中,目标是一个在欲念(gewunsch)下被设定的具体的追求对象,而目的则是与所有经验相关的伴随现象,是经验历史运动潜在但却明确的价值方向,即便没有被察觉,却是所有的行为本身不自觉展现的共同意愿(gewollt)。当平等被当成目标去实现,就非常容易被意识形态地工具化或者口号化,而当平等作为目的本身来被对待,那么这样的平等就可以反过来作为奠基性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提供价值的引导。从基督教的角度上看,这种价值引导就是由具有启示色彩的创世论所建构出来的平等能够始终作为自然法和人类历史的终极根源。所以,民主的意涵在态度民主那里是作为一种始源的原因而存在,而在情绪民主那里则是作为一种结果等待被获取,在这样的基础上,态度民主意义上的民主,总是让民主的内涵作为一种价值本体自上而下地漫溢,它不会被化约为旨在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的"多数原则",而总是试图提升民众的普遍道德和价值信仰,以能够终极地解决问题。

〔9〕魏玛民国的保守革命对此也有类似呼声:因此,我们必须用内在价值代替平等,用对领袖的有机选举代替机械选举,用民族共同体的权利代替共和。参见曹卫东 CAO Weidong 主编,《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Weijishike*:*Deguo baoshou zhuyi*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上海 Shang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4),20。

二、基督教民主

毫无疑问,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是以态度民主而不是情绪民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通过对情绪民主和态度民主的区分,舍勒得以用基督教的价值理念去具体地诠释态度民主所依赖的价值本体究竟为何,又如何在与情绪民主的差异中,论述基督教的价值引导过程。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浪潮,尤其是对于将民主的含义局限在建立民主政府或者政党政治的民主运动而言,舍勒的基督教民主理念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对于这些民主运动本身的一次民主洗礼。具体而言,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是从人格主义、气质塑造以及万物一体感等几方面来说明这种洗礼的。

正如教宗列奥十三世在他的通谕 *Graves de Communi Re*〔10〕中所提到的那样,基督教民主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建立无差别的绝对平等的社会,而是在尊重私有财产的同时,致力于民众整体生活福利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舍勒也认为,与追求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平等的代议制民主不同,基督教式的民主认为一定程度上阶层等差的存在和对这种差异的顺服的心态,始终是实现个体自由的重要保障;此外,一定规模的上层精英阶层的存在,并没有破坏社会的公义和平等,反而对于一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尤其就维护和提升其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而言是有利的。他提到天主教徒对于教皇的崇敬与民众对于独裁者的屈服是全然不同的两种事情,就前者而言,这是将对于更高价值的追求放入到自我实现的意向过程之中,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在基督教民主的语境中,并不是自由的抗争带来了真理,相反,是真理的存在本身使人自由。这样的颠覆了的自由观使得民主不再局限于政治视野中被方法论化和工具化,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整体性关切。对舍勒而言,他关注的更多的并不是遴选候选人的公平程度或者投票权的分布这样具体的民主程序的执行问题,而是民主精神从根源上看作为以人本主义为价值基础的政治理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守护。所以舍勒眼中的基督教民主始终要求从人格主义的精神层面去实践平等,包括行动动机的平等、意志力的平等、反思力的平等等等,换言之,它要求的是人的人格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充分平等。而这样的民主理念之所以能够被赋予基督教的色彩,不仅在于人格平等是基督教的创世论最基本的观点,对于万物的尊重也是有着宗教色彩的律令性质,同时,正如经院哲学和卡尔·拉纳的神学人类学所都曾论述过的那样,爱上帝的意志、聆听圣言的能力,乃至于被拯救的命运也都是不同人群的潜在共同性,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在充分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和共契,以精神意向和情感的共同需求,在不同的人群中建立以教义为核心的价值凝聚,相较而言,许多以情绪民主为思维原型的民主运动为了建立这样的价值凝聚,往往以抹杀独立个体的个性为手段,因而只能建构出消极意义上的相等。

基督教民主以人格的平等和自我实现作为基本诉求,在从基督教的价值立场上对比出许多民主运动的缺失和盲点的同时,也塑造出了在民主运动的一种沉静而雍容的气质与态度。正如对于自由本身的遗忘要比自由被剥夺更为严重,对待平等本身的态度亦要比实在地实现这种平等更为重要。〔11〕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所试图解决的不是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而是通过价值的奠基和引导的方式来锻造一种精神气质和人性品格,尤其从现实生存目不暇接的利益选择的浮躁回归到那种通过对世界的沉思而获得的不动如初的宁静中去,〔12〕而从创造之美中体会到平等

〔10〕 Leo XIII, "*Graves de Communi Re*", (January 18, 1901, On Christian Democracy). 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Leo13/l13grcom.htm。

〔11〕 Richard John NEUHAUS, *Doing Well & Doing Good: the Challenge to the Christian Capitalist*,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5。

〔12〕 Christian BERMES, Wolfhart Henckmann and Heinz Leonardy, eds., *Solidarität: Person & Soziale Welt*, (Königshausen u.: Neumann, 2005), 12。

的先验意涵。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许多在情绪民主影响之下的民主运动却往往以革命抗争的暴力作为基本诉求，这与基督教民主所倡议的在价值的自我涵泳中所获得的平静有着极大区别，同时也彰显出了一种自圣的傲慢。在基督教民主的视野中，现代政党文化下许多政客念兹在兹的人民最大或者人民主权论实际上根本不是民主思想，真正意义上的民贵思想不能只用政治的平等来表现，它需要以超越政治民主的宗教理念作为更深刻的价值根据。正如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批评的那样，许多义正言辞的政客事实上根本无法清楚定义何为人民，何为主权。法国学者沙辛(Emile Perreau-Saussine)也认为，人人平等的概念背后隐藏着泛神论的倾向，使得每个人都变成了神圣的人民。[13] 而当例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社会学者认为民主制度已经是人类社会最终极的形态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混淆了民主和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因为即便人类社会可以用民主制度建立恐怖的平衡来压抑人的各种邪恶的冲动，但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与过去世界的关系乃至于与自己的相处，都无法用这样的民主制来处理。如果很多以选举的胜利为最终目标的议会式民主强调是的一种强烈的意志力和有效的行动力，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思想却是试图在基督教价值的信仰的基础上凭借一种价值自信而锻造出相对柔和而雍容的精神气质，尤其是试图培育出对人类共同命运和创世荣美的体认和对平等更为深刻的理解，Amintore Fanfani 在他的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一书中表达的“让所有的行动都变成道德行动甚至宗教行动”的愿望事实上也是与这种精神气质的塑造相关的，[14]所以如何将民主运动从一种主智文化转变为一种主情文化，也是基督教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舍勒在他的 *Christilische Demokratismus* 一文中多次表达了对于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推崇，因为惠特曼也同样不是从一般的政治意义上去理解民主，而是在更为广阔的人类学的视野中，将民主文化看成是人的诗性修养。在他的《自我之歌》(*The Song of Myself*)中，惠特曼通过对自己的身体官能的夸张描绘，刻画出万物之间彼此呼应的融合感(responsive connectedness)，[15]但这种融感合并非是要为了凸显“我”的特殊价值，而是表达对这个世界，当其还没有彼此之分而融为一体时的赞美。这种在“一切人中看到我自己，不多也不差毫厘”或者“一片草叶的意义不亚于行星的运转”这样的诗句中所体现出来的万物之间普遍联系而彼此关切的平等和谐，正是惠特曼眼中真正的民主所要实现的。同时，这种民主的要求，从某种角度上看，它亦是自己对自己的具有立法意义的绝对要求，正如惠特曼在他的 *Democratic Vistas*[16] 所描述的那样，民主的目的就在于要求人突破各种传统思维的思想限制，不仅仅去实现对自我的控制，更将对他人和外在世界的责任看成是绝对的义务。所以，这里的民主实际上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不仅表达了对待世界的友好态度，也代表了时刻准备的奉献状态(Willensbereitschaft)，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民主总是在消极地维护社会秩序不同，舍勒和惠特曼所理解的民主，却在积极地开拓与实现早被应许前定和谐。舍勒用“亚当子孙共同的形而上学命运”作为民主的终极根据，相比于自然法的法理基础，这种根据以基督教的创世论保证了民主是在积极地展现创造之美，而非消极地防御人性之恶的意义上获得其必要性的。正是这样的基础上，舍勒的基督教民主将民主的内涵从政治的视野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人类学视野，从而不仅被受压迫的弱者需要有民主的要求，被人类中心主义冷落了几千年的自然界，甚至于“存在即合理”的无机物世界和消逝的时空也都也需要有一个被民主化的过程。这种万世万物都需要民主化的理念，以深情的普世同情感表达了万物存在却遭冷落和践踏的悲悯。

---

〔13〕 Emile PERREAU-SAUSSIE, *Catholicism and Democracy: An Essa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95。

〔14〕 Amintore FANFANI,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Norfolk, VA: IHS Press 2003), 107。

〔15〕 George KATEH, “Walt Whitman and Culture of Democracy”, *Political Theory* 18(4) (November, 1990), 547。

〔16〕 Walt WHITMAN, “Democratic Vistas”, http://xroads.virginia.edu/~hyper/Whitman/vistas/vistas.html。

无论是彰显人格的平等,还是培育沉静的精神气质,还是对于万物一体感的特殊理解,基督教民主都建立在对于其教义充分的价值自信之上,这事实上也是它区分于其他民主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舍勒眼中,许多民主运动已然不具备任何对客体价值或者公共善的信仰,这导致民主运动的最终结果纷繁多样,它可能带来宪政主义,但也有可能带来无政府主义、现代国家主义或拿破仑的军事扩张主义等等;同样,民主运动也可以变成为各种不同的人文主义运动所依赖的政治基础,在不同的目的论体系的牵引和控制下孕育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后果。总之,舍勒认为,丧失对于客体善的信仰或者说不承认某种程度上的价值序列的存在,会使得民主运动无法洞悉历史中的逻各斯的存在,而最终滥觞于各种主观主义之中。

三、基督教贵族主义

虽然舍勒对于基督教的价值表现出了充分的信任,但舍勒的基督教民主中的所谓基督教仍然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在他的著述中,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不同的派别,基于它们各自教义的差异,对于基督教价值和民主价值的融合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看法,在这样的基础上,厘清这些不同派别各自立场和论述,对于更深入地理解舍勒的基督教民主的理念是非常有必要的。总的来看,舍勒希望建构的是具有现代品格而积极作为、较少意识形态包袱而相对纯粹的基督教精神。一方面,他批判东正教会的保守封闭禁锢了人的创造力价值而毫无现代气质和现实作为;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让基督教避免被外在的政治经济因素过度影响,而出现如 19 世纪法国耶稣会为世俗的高卢主义和法兰西国家精神服务,或者如英国的清教徒用预定论理念将人分成不同种类的情况。因而舍勒事实上也展开了对于基督教自身的批判,尤其是对基督教过度地介入现代世俗生活以及封闭在传统教义和历史中毫无现实作为这两种极端现象的批判。舍勒的这些对不同基督教派的对比比较事实上也是在维系基督教作为一种贵族主义价值的立场而帮助其在现代社会中寻找到合适的自我定位,因为贵族主义绝不是亢奋的入世精神和隐逸的出世情怀那样的极端情感,而是对这两者的综合超越,在始终维系对先验价值领域的纯粹直观中,一方面彰显这个世界的积极的在世责任而不逃避,另一方面彰显只以它自身的变化为基础的游刃有余的从容态度而不盲从。在舍勒看来,只有这样的贵族主义气质为基础,基督教精神才能在现代社会中有效地发挥出对于民主和其他世俗价值的引导作用。

在他的 *Über östliches und westliches Christentum* 一文中,舍勒多次表达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满,认为他的作品中对于俄国东正教的描述欺骗了大部分西欧的读者,因为它描绘的并非东正教的真正面貌。[17]在他眼中,东正教对于人、对于情感和对于世界的理解,与西欧的基督教有着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东正教不能如天主教或新教那样完成现代革新或者展露出现代性品格,遑论与现代民主或者其他现代文化进行某种价值融合。例如,舍勒提到东正教始终贬抑人的个体主义价值和自由精神,在灵肉对立的二元论中否弃人的肉体和任何的在世创造。它推崇仿效古代的隐士隐匿沙漠的苦修生活,而不承认在工作和奉献中所展现出来的禁欲和自我修炼。[18]同时,东正教重视终末性远大于在世性,因而追求幽暗的神秘主义情感,一方面强调在圣礼仪式中的入神状态,而不是圣礼对于罪的洗涤作用;另一方面表达对上帝的真实的恐惧和颤栗,一如屈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大法官。最后,东正教对于这个世界也表现出了极端的不信任,舍勒引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话说,东正教既不同意任何历史的计划的学说,也反对宗教的社会化和建制化,而只要求精神上的彻底洁净。[19]总而言之,舍勒认为在东正教的传统中,找

〔17〕 SCHELER,GW 6,100。

〔18〕 *Ibid.*,pp. 103。

〔19〕 *Ibid.*,pp. 106。

不到那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替代性和同时性，使得爱邻人的本质能与爱上帝等同，也找不到历史变化前进的韵律感和某种宇宙论的演绎过程，使得启示可以在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困境中通过自我开发和自我启示转变为积极的道德力量。这些对于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尤其对各种世俗价值进行有效的批判或者价值融合都是不利的。在这个方面，舍勒推崇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将在世的苦难感进一步转换为创造性的爱的力量的做法，认为奥古斯丁让爱避免成为冥想的结果，而是在具体的行动中体现出来，这不仅为个体主义的自由创造精神，尤其是勤奋和坚毅品格的发挥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有利于将苦难感转换为普世的同情感，建筑起同一种命运下的人类共同体，而这种个体创造和集体团结的有效结合和共同呈现，正是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所期许的理想结果。

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舍勒还批判了同样是正教传统的托尔斯泰，认为他的许多对于基督教的论述有着非常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这是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的强烈批判。舍勒认为虽然这些论述深刻而温馨，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有着鄙弃政治文化的特殊政治立场以及俄国特有的农奴文化对基督教精神的外在扭曲。这样的扭曲在19世纪被迫参与到启蒙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殖民活动或者直接参与政治权力争夺的法国天主教那里体现得更为直观，舍勒认为这些在政治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基督教价值已经非常浑浊，并不能作为基督教民主所依赖的价值基础。〔20〕而对于这种相对纯粹的基督教价值究竟是何种内涵，舍勒曾试图通过比较俄国、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四个国家的民主运动和宗教精神具体的结合情况来探索，但也似乎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结论，他一度非常推崇路德在教改初期的所建构的宗教氛围，但在德国一战之后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舍勒也没有信心认为路德的宗教精神能够被很好地执行出来。〔21〕然而，舍勒在他的论述中没有考察当时的新兴大国美国的情况，事实上，作为一片没有历史传统包袱和意识形态遗产的土地，19世纪的美国正是某种纯粹基督教价值理想的实验场所，这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即有体现。所以说若能考虑美国的情况，舍勒对于基督教民主的前途或者会有更大的信心。

托克维尔在他的 *Democracy in America*〔22〕中通过对19世纪美国的民主化和工业化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探讨他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对于宗教的影响，尤其是在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环境之中，宗教精神如何能被相对纯粹地理解和表达，这与韦伯的宗教性格如何影响经济行为的研究进路正好相反。清教徒在美国的宗教实践原本就有着很大的理想主义色彩，它挣脱了很多的原来欧洲大陆千丝万缕的社会政治关系和历史包袱，而可以在不毛之地的美洲新大陆上用乌托邦的情怀去彻底地实践新教教义的宗教理想，既避免了加尔文主义的严酷城邦律法，也避免了爱尔兰的天主教徒那样的在宗教权威和自身的民族主义利益之间纠葛。〔23〕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宗教不再成为斗争工具，而是成为它本身。托克维尔提到美国人的宗教狂热程度远较欧洲大陆为高，〔24〕但这种狂热并非源自于教派斗争的政治或者历史的抱负。他提到美国建国初期的一些州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守礼拜天”(observe Sunday)的传统，在每一周的第一天停止绝大部分的社会活动，这不仅与当时大西洋彼岸的欧洲革命中如火如荼的反基督教运动截然不同，亦跟后来美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守礼拜的传统将礼拜天看成是一个圣日，要求信徒在这一天反思工作和艰辛生活背后的意义，以及生活价值最终的源泉，它已经不是经济学上保育环境和体力的休养生息的考虑，更多的是用对于闲暇与从容的尊重来表达对于创造这个启示行

〔20〕 *Ibid.*, pp. 170。

〔21〕 *Ibid.*, pp. 173。

〔22〕 Alexis de, *Democracy in America: Historical-Critical Edition of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ed., Eduardo Nolla, trans., James T. Schleifer, (Indianapolis, Indiana: Liberty Fund, Inc. bilingual edition, 2009)。

〔23〕 Thomas BOKENKOTTER, “Chapter three: Daniel O'Connell (1775－1847): Liberal Catholic Leader of a Bloodless Revolution” in *Catholicism and Revolution: Catholics in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Image Books, 1998), 82-111。

〔24〕 TOCQUEVILLE: “These sublime instincts do not arise from a caprice of the will; they have their unchanging foundation in his nature; they exist despite his efforts. He can hinder and deform them, but not destroy them.” Se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940。

为本身的敬畏。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先验的动机和结果的计较都被排除掉了,剩下的就只有用纯粹的顺服的情感来表达对于存在本身的感恩。托克维尔在他的书中又提到,美国社会民主和平等的环境也让天主教这样威权型宗教可以不用外在的强力压迫别的宗教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威信,而是用契合信徒内心的对于合一的需求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力。[25] 他认为这样的方式可能会让信徒人数会减少,却为公教精神赢得了更为深厚的哲学和心理基础,所以在最民主的美国,最保守的天主教反而得到最大的发展。他亦提到在美国各种不同理念的教派基督教教派林立,但彼此却甚少冲突,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社会本身对于自由平等理念的崇尚,更是因为实际上这些教派都认同基督性(Christness itself)作为彼此之间共同的价值基础,[26]以至没有了对教义进行攻击和防卫的需要。所以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传统意义上神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基督教哲学所取代。[27]

托克维尔对于美国天主教的描绘与舍勒所设想的现代社会中天主教会理想的存在非常接近。舍勒虽然自小就对建制化的天主教会颇有好感,但是他却并没有非常强烈的护教意识,也没有从传统的系统神学的论述框架而是从哲学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天主教会传统的教义和它在现代社会的展开。[28]他希望天主教会愿意向世界开放自己,在它与别的宗教和世俗文化的对话中,而不是对于自己的传统的重复演说中去说明自身的价值真理性,这样的用价值理念的凝聚替代历史传统的凝聚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是放弃了自己的根基,但实际上却充分表达了对于偶然和境遇的尊重,而用偶然之间相遇的必然来论证教义的基础性,而不是用传统意义上教义的必然性来统治这些偶然。[29]在这样的基础上,许多天主教会所坚守的保守价值,例如天主教会的威权制,才有可能更广大的时空环境所代表的整体性中,令人信服地被理解和认同。[30]这样的一种对于天主教的理解,正是舍勒眼中挣脱历史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包袱的某种纯粹的基督教精神,它总是在更为广大的时空视野和真理的运作场域中去证明自己,让教义的必然性不仅仅局限于逻辑意义上的必然,更是内容和价值上的必然,同时,它也从竭力论证为何基督教的真理是有效的转换到了去说明为何它与这个世界的交流是有效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基督教对于民主制度所发挥的价值引导作用就需要彻底摆脱究竟是哪种基督教派或者符合哪一位教父的论述这样的思维方式,而是还原出基督教在创立之初作为一种解放和拯救时的价值力量。

四、总结

总的来看,舍勒的基督教民主也许确然无法演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政治实践,实际上舍勒也始终并没有否认议会式民主制度的必要性,但他通过对于情绪民主和态度民主的区分和从基督教的视角去理解民主更深层次的内涵,尖锐地指出了现代社会对于民主理念有着一种迷思,尤其是为了民主而民主的做法(Demokratie durch Demokratie)。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思想的核心是体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中的团结即民主的思想,他甚至不反对在战后德国的保守革命中,用战争的方式来凝聚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认同,即便这种凝聚在后来演变为具有侵略性的战争机器,因为他论述民主的出发点始

〔25〕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755。

〔26〕 TOCQUEVIL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ristian sects vary infinitely and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but Christianity itself is an established and irresistible fact that no one attempts to attack or defend." Se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707。

〔27〕 在一封 1843 年写给 Arthur de Gobineau 的信中,TOCQUEVILLE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TOCQUEVILLE: "Our society has moved away much more from theology than from Christian philosophy." Se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961。

〔28〕 Wolfhart HENCHMANN, *Max Scheler*, (Verlag: C. H. Beck), 16。

〔29〕 See Quentin MEILLASSOUX,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trans., Ray Brassier,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30〕 See Michele DILLON, *Catholic Identity: Balancing Reason, Faith,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终着眼的是一个社会,乃至于整个人类的凝聚效果,而希望人际之间可以彼此承担共同的责任,分享共同的命运,这实际上正是基督教非常原始却朴素真诚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愿望,这与那种强调教会内的民主改革,尤其是在教会的体制和思想传统中去发掘民主的因素、探讨教会内部的民主生活可能性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31]在这个意义上,同志平权运动、环境保护议题、乃至于修缮文物、保存一处历史遗迹,都可以是民主运动。教会的民主化虽然符合世俗社会对于教会的期待,却在很大程度上折损了基督教特殊的宗教价值,对于参与现代民主运动却时常捉襟见肘、力有未逮的现代教会,尤其是对于保守的天主教会建立自己的社会教义和政治态度而言,[32]舍勒对于基督教民主内涵的表达方式非常有启示的意义,与其费力思考究竟改用怎样的方式去调和宗教立场和世俗的政治理念,倒不如改换视野,回归到自身的价值中,通过宗教价值和世俗价值的张力将这些世俗理念提升到更深的层次,这或者才是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而有效的自我定位。

〔31〕 Thomas SCHIRRMACHER,"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Evangelical Theological Review* 35,(Jan 2011),53。

〔32〕 See Ralph GIBSON,*A Social History of French Catholicism*,1789－1914,(London:Routledge,1989),147。

English Title:

From Even to Equality: Max Scheler on Christian Democracy

LI Jing, Ph. D in Religious Studies (CUHK, 2016), postdoc researche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16-). Mail Address: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Xichang Build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el: +86-147-1601-5529, Email: youblatterme@gmail. 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Max Scheler's discussion of Christian democracy, he proposes this conception as a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when reflecting the reunion of the war-ruined Europe after the WWI. This Christian democracy is different from political democracy, as it emphasizes the value of ecumenical equality from the special perspective of Christian Revelation. It is this recognition of equality that helps to cultivate the religiou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ethos, from which Christianity could lay its found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dmirable social order. Scheler's Christian democracy helps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when it is overwhelmingly occupied in electoral culture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value to it. This process is also a self-reflection of the meaning and status in modern society for the modern Christian church.

Key Words: Max Scheler; Christian democracy; Christian social teaching